

书评

Book Review

Jack Meng-Tat Chia. 2020.
Monks in Motion:
Buddhism and Modernity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蓝佩鋈

(LAM Chui Peng)

本书围绕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迁移，以及中国与海洋东南亚佛教社群的联系展开论述。谢明达博士通过竺摩（1913-2002）、演培（1917-1996）和体正（1923-2002）三位僧人的生命历程和弘法模式展现佛教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流动，包括佛教思想、知识和制度的传递。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南海佛教”是指从横跨中国南海的佛教网络中形成的海洋东南亚佛教形式，其特点在于宗教仪式和经文中采用普通话、中国南方方言和东南亚语言。南海佛教关注佛教群体在中国和海洋东南亚之间的流动和网络的形成，从僧侣的教育背景、游历参学、僧侣法缘以及其与后殖民国家的互动，探讨南海佛教的形成、佛教现代主义的传播，以及应个别社会和政治情况而生的佛教建设和贡献。

本书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移民、僧侣

和寺院的串联探讨佛教网络如何横跨中国南海、海洋东南亚佛教社群的出现,以及该群体对中国制度性佛教在东南亚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作者讨论早期海外华人移民所实践的佛教形式,以及19世纪末中国僧侣、佛教思想与制度性佛教传入东南亚的契机。中国佛教改革、南普陀寺和太虚的连接及其影响,以及僧人到海洋东南亚弘法、为中国建寺和战争救援在海外募款等事件体现中国与东南亚的跨国佛教网络,包括僧侣、佛教思想和资金的跨区域流动。

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从竺摩、演培和体正的生平和佛教事业探讨他们如何运用佛教教义和个人历史记忆体现佛教在各自国家的发展、特点及影响。第二章论述竺摩自1959年抵达马来西亚后对汉传佛教的建设。竺摩借鉴太虚倡议的“人生佛教”思想重新定义马来西亚华人佛教徒的身份及推动皈依运动。他在创建三慧讲堂时采用讲堂式建筑风格以凸显其教育功能大于经忏仪式;著述经典、设立佛教课程和教育机构培养僧信人才,发展佛教教育。除了宣扬正信佛教,他也积极促成马来西亚华人佛教群体的皈依。移民僧人的流动拓展和修正人们对佛教现代主义的理解,也改变后殖民时期马来西亚的宗教景象。

第三章讲述演培和华人离散地的人间佛教。演培的弘法足迹遍布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因而促成上座部和大乘佛教的连接,并与东南亚佛教界建立联系。他主持新加坡灵峰般若讲堂时也善用人脉广邀海外僧人讲学,使讲堂成为全球佛教网络的关键节点。演培深受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熏陶,1964年落户新加坡后以弘扬佛教和推广佛教教育为主,后期则成立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等慈善机构,动员佛教徒一同投身社会服务。演培的个案说明移民僧人扮演连接中国和东南亚佛教社群的关键角色,也刻画了新加坡佛教如何与20世纪下半叶更广泛的佛教移民群体以及跨地区佛教传播的交织。

第四章考察体正的佛教现代主义思想和印尼的佛教改革。体正淡化佛教的中国色彩来确保少数派宗教能够立足于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他以印尼历史中的佛教痕迹和历史遗迹婆罗浮屠为佛教正名,也立志将佛教推广到印尼的非华人群体。体正提出的观点有别于在新马华人佛教群体

间传播的佛教理念。他推动的佛乘运动是不分宗派教义和实践，符合国情和国家格言“异中求同”的印尼佛教，并借此破除佛教作为印尼华人独有的宗教和文化之形象。体正结合多个国家和宗派的僧伽教育以及佛教网络，同时契合政治需求，形成独树一帜的印尼佛教。

作者总结认为，三位僧人秉持的佛教现代主义对教义和宗教实践作出新诠释，并在马、新、印成立新的佛教机构和空间来推广各自的观点。由于佛教现代主义形成于跨国流通和本土环境的结合，因此南海佛教是独特的、服务于本土佛教群体的海洋东南亚佛教形式，而非中国大乘佛教和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的延伸。此外，作者也提出后续研究的可行性和方向。

本书不仅仅是叙述僧人流动与佛教网络如何促成中国和海洋东南亚两地佛教的连接和发展。作为历史学者，作者在个案研究中紧扣时代背景、社会和政治变革，结合时代历史和个人记忆进行叙事。本书表明海洋东南亚的佛教现代主义是寻求传统佛教教义与时代问题关联性的宗教运动，也表达对宗教和民族特殊性的主张。因此研究成果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历史背景下的东南亚华人佛教移民史；二是僧人应各别国情进行佛教改革及其贡献。前者是佛教移民如何在当地形成佛教社群及推动佛教发展；后者则探讨僧人的佛教现代主义如何促使他们成为后殖民时期海洋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先行者。

回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僧侣因担忧佛教的发展而向外迁移；另一方面，海洋东南亚国家正开启后殖民时期，其甚具规模的华人佛教社群成为中国僧侣的移民选择，从而开启跨国弘法历程。太虚和厦门南普陀寺作为佛教现代主义的象征，在跨区域流动的佛教网络扮演关键角色。竺摩和演培曾在闽南佛学院学习并深受太虚影响，后因太虚的法缘辗转移民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致力于弘扬正信佛教、推广佛教教育、关注社会福祉，开展两地佛教的新景象。体正则为印尼土生土长的僧人，多元化的世俗和僧伽教育造就了他兼容各宗派的思想。相比移民僧人，深谙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和本土语言文字让他可面向不同族群传播佛教，并以历史和遗迹证明佛教是属于印尼人民的宗教。虽然他的佛教改革备受争议，但无可否认，他的努力让佛教在苏哈托的反共政治议程中保全宗教合法

性，并受到当权者的认可。三位僧人的宗教耕耘让南海佛教可以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海洋东南亚立足，并随着僧侣的佛教网络向外传播和发展。

从被殖民时期到国家独立后，僧侣在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发挥稳定人心的作用，同时通过成立宗教组织来维护佛教的宗教合法性和话语权。竺摩、演培和体正与国家和社会领袖保持良好关系无疑让佛教得到当地社会和民众的肯定，甚至推动国家外交发展。谢明达博士便曾撰写新加坡移民僧人宏船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宗教往来间接促成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此外，僧人的佛教网络让当地与海外佛教建立联系，例如马来西亚僧人到台湾接受僧伽教育及领受三坛大戒、海外佛教徒前往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朝圣和台湾佛教团体在新、马、印的传播。以宗教联系打破政治或民族藩篱，是僧侣和南海佛教不可忽略的贡献之一。